

目 录

参加红军的前前后后

.....李文清（1）

难忘的印象

.....裴希天（11）

松滋女杰——忆李平烈士

.....李梅村（18）

我对李平同志的片断回忆

.....傅耀南（20）

李璉夫同志二三事

.....李丁生（23）

怀念父亲雷鸣泽

.....雷元荆（26）

我的老师雷葆杏

.....刘明哲（31）

我的祖父姚亚英

.....姚永铮（35）

回忆堂叔周维藩

.....周经然（41）

悼念李永禄

.....朱善伯（50）

本一法师

.....胡正新(55)

胡人佛

.....胡远怀(58)

陈超群暂斗赵益之

.....向富山(60)

旧社会农民的“四怕”

.....张必发(65)

“自卫征实”和“大户献粮”

.....马操元(69)

锈水沟硫铁矿的历史变革地中兴

.....王雨村(72)

民国时期卫生纪事

.....苏以翔(81)

民国时期县长(知事)政事纪略(续完)

.....陆垂满(86)

八宝垅下南宫闸倒闸溃口的前后

.....胡正新(95)

杨林陶业

.....汪泽文 文秉恕(102)

老城史话

.....胡思勇(106)

松滋凶年史料

.....薛金平(115)

参加红军的前前后后

李文清

一九八四年，我因公顺路，回到家乡湖北松滋街河市，这是我参加红军离开家乡之后第三次回去。前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二年我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顺路回去，另一次是一九七三年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赴京治病，绕道回到家乡。我每次回到家乡都看到一些新的变化，引起一番感慨，最近一次回去，看到的变化特别令人惊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春风使家乡的面貌，完全变了个样子，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哪里还有一点半个多世纪以前，我离家投奔红军前，那个湘鄂边界穷乡僻壤的一丝半点影子呢？尽管它和外地相比，有些地方还有一定的差距，从总体上讲，人们还不算十分富裕，但和十年前“文革”中比，和三十年前建国之初比，和四十年前的旧中国比，真是步步登高，有天壤之别啊！

从我个人来说，走上革命之路，决不是先知先觉，也并非先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完全是因为穷困和忍受不了恶霸地主的欺侮，被逼迫走上了革命之路的。是在革命队伍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受到了红军队伍正确思想的熏陶，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明确了革命的目标，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曲折坎坷的征途上，经受了

战火的洗礼，政治风暴的冲刷，才逐渐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

回想当初，我作为一个穷人的孩子，世世代代贫苦农民的儿子，我懂得什么呢？懂得的就是时日艰难。从我记事时起，看到的就是父母整日布满愁云的面孔，看到他们日出而起，日暮而归，勤耕苦作。每年除去交给地主家的租谷，就看不见有几颗米挑进家门，地主家少爷、孙少爷们却吃香喝甜，穿绸着缎，读书游戏，而我们穷人的孩子则少穿缺吃，三九天还赤着一双冻红的脚板跑来跑去。

我的父母，也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期望自己的子女成材成器，对我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特别重视。他们宁可自己受苦受累，勒紧裤带，也要把我送到义学去读书，奢望有朝一日，我能有些出息，好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最少也能让一家人吃上饱饭，可我怎能读得进去？一家老少几口，祖母年老多病，一姐一妹都得帮父母干活；按照当时的规矩，租佃地主家的土地租粮和佣工各半，因此每年除给地主缴三到四成的租粮外，母亲还得到地主家干活。父亲一人在那瘠薄的土地上耕作，怎能换来一家人的温饱呢？因此我很小也就辍学回家干活了。

我十六岁那年，家里租佃地主李心仁的岩渣地七亩，房屋三间。那岩渣地，贫瘠得出奇，不管你投入多少功夫，也打不下几粒粮食。为了多得一点粮食养家糊口，就必须多给地主家做工，家里人手不够，父亲就想早日给我成亲，以为早日添丁进口，也许能多点收入。于是在我十七岁那年，就把叔伯表妹邹么儿娶来给我为妻，因为沾亲带故，可以免去筹集彩礼钱之苦。由于家境清寒，谈不上什么婚礼的操办。

婚后不久，妻子就到二少爷李锡武家帮他带孩子。在我们结婚时，亲戚邻里送的一点点茶钱，大约有几百个铜板，我把它小心翼翼地存起来，以便他日别人办事时好还情。

结婚既没给我、也没给家里带来任何欢乐，不但没有时来运转，而且天公似乎偏要和我们作对，松滋遇到了两百年没有过的大旱，田地所收无几，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外出谋生。于是我抛下父母，离开新婚的妻子，托隔房叔父李学义说情，跑到百余里外江陵县湖区邱家槽房一家王姓去做长工。起早贪黑，放牛、耕种，什么活都干，希望一年能挣几吊钱带回去养家。可是我的时运总是多舛，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又遇到了麻烦事。有一天，大清早还没吃早饭，我牵牛出去放，当我把牛拴在树上，走去解手时，突然水牛挣脱了牛鼻绳，疯狂地奔跑起来，在附近麦苗地里边跑边吃。这可把我吓坏了，也顾不得解手，拼命地去追赶，好不容易把牛捉住了，可是只见牛肚子越胀越大，不到半天时间就倒地死掉了。据说是得了青草疯，这下可闯了大祸，王老板大怒，非要我赔他的牛不可，我哪里有钱去赔他呢！于是他夺了我的铺盖，扣了我全年的工钱，并把我赶了出去。一年的活儿算是白干了，铺盖也没了，我腰无半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李家河我那穷困的家中。

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人穷总是受人欺。家里一场厄运正等着我呢？我回去以后，就连忙跑到地主二少爷家去，想接新婚后久别的妻子邹么儿回家团聚，可是我万没想到，妻子早已落到人家手中，刚进地主家门，就不明不白地遭到了一顿毒打，不由分说连打带踢地把我赶了出来，原来是地主少爷李锡武早就把她霸占了。当时我真是怒火心中烧，恨不

得一刀把他宰了，可是当时手中没有刀，回家以后怎么也想不通。第二天晚上，我找了一把“黄鳝尾”去找李锡武算账，跑到花桥庙，被本家一位大爷看到了，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满脸杀气，忙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说要杀李锡武报仇，他一把夺下我的刀，厉声地教训我：“你不要命啦，你一个人有多大本事，人家有财有势，家里不是团董就是保董，你斗得过他吗？这不是白白送死吗？你妈在三少爷家帮工，还不如送点礼去托他跟他兄弟说个情，也许会把你老婆放出来。”听了他老人家的规劝，我只好回家找出那三百个铜板的茶钱，买了些点心，提到三少爷家中，好不容易进了他家的门，见他正躺在床上抽大烟，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爬起来一烟枪打在我的头上，立即肿起了一个大包。他还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土匪，你要杀我的二哥还要来杀我不成！”接着又是一顿毒打，并让人把我轰了出来。我真是又气又恨，热血直往头上涌，怀着满腔的怒火，下定决心：

“这个仇非报不可，不杀了这几个狗娘养的就不是人！”

可是怎么才能报这个仇呢？我夜思日想，到处打听。我听到了关于农民协会的事，听到了九岭岗曾经有过农民暴动的事，听到了有一支穷人队伍的事，虽然对这些事的本身没有什么了解，但我听到那些老财们讲过什么：“日起党，夜组团，组得老子心头烦，有朝一日落到我的手，要用篾杆把你穿”的顺口溜，我心里想既然能使老财们胆颤心寒，恨之入骨的党和团，一定是对穷人好的队伍。因此，我心中不觉一亮，想到要报仇，就非要找到这个部队不可。于是我就更加留心打听起来。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正当锄棉花草的季节，一天当我正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看见地主老财家的人携带箱笼包裹，慌里慌张朝县城方向跑去，心里有些奇怪，连忙丢下锄头，想跑去看个究竟。走到村里，碰上街河市孙纸匠的儿子，他正到处找我，他悄悄问我：“李业文（这是我过去的名字）你还想不想报仇啊？”我果断地回答：“当然想！”他说：“好！那就一起参加贺家常娃的队伍去。”他还告诉我这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就在附近活动，要我作好随时走的准备。我记得他还约了李业和、李业成、李学泉等，连他和我一共五个人。

那两天我兴奋得很，想到这下报仇的机会总算来了，看你狗娘养的三少爷、二少爷还往那里跑。可又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很怕见不到这支队伍，错过了机会，有时坐在村口路边，眼巴巴地望着大路，有时又跑到街河市去看看，但这一切都瞒着我的父母和周围的人。没几天，终于听到了消息，我们赶紧奔杨林市而去，快到杨林市时，天刚擦黑，我一眼看到一支队伍正在过河，就连忙跑过去，嘿！好家伙，这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没有统一的军装，身上穿的衣服，脚上蹬的鞋子，真是五花八门，不成样子，再看看肩上背的武器吧！也不整齐，枪筒子有的粗，有的细，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根本没有枪，就拿一把刀，有的扛一杆梭镖。别看装备不好，可是个个都精神抖擞，劲头十足，走起路来只听脚下一片嚓嚓的响声，快步如飞。看到他们不由得也使人力量倍增，受到很大鼓舞，我挨了过去，抓住一个战士的袖子问道：“老总！你们是贺家常娃的队伍吗？”他神气活现地点点头，但又立即纠正道：“什么贺家常娃，是贺军长”。

“军长，就是军长”我急切地问：“我参加一个，你们要不

要？”他边走边打量我，走在前面的几个人，也连连回头望着我直笑，我心中真有些发毛，生怕别人不要我。

到了杨林市街，队伍歇下来不久，那个战士走来对我说，他跟连长讲过了，让我留在他们队伍里，听他这么一说，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嚷着：“这下子可好了，我给贺军长当兵啦！”班长还郑重地告诉我：“记住，我们是红军十一团一营一连，是穷人的队伍，知道吗？”“知道，知道，我找的正是你们，要不，我还不参加呢。”接着我又急忙地说：“走，我带你们打老财去，我要去报仇！”

半夜时分，忽然一阵枪响，听说是团防队来打我们的。当时没有发生正面冲突，我背上新发的一把大刀，跟着队伍从后山坳向西，经巴芒滩，雷井口过长滩河走了。

第二天早晨，队伍在西斋集合，班里一个老战士拍拍我的肩说：“快看，贺军长来啦。”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大约三十多岁，正快步地朝队伍中间的空地走来。他穿一件布长袍，头上缠着很大的青布盘，手拿长长的旱烟杆，赤脚穿着草鞋，上唇一抹浓黑的短胡须，有点俏皮地朝大家微笑着，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威武，机灵，爽利，心想跟着他干，一定有办法。由于站得较远，贺军长讲的话没听清，只听到一句口号：“打到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去，打土豪，分田地”！

就这样，我不仅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战士，而且还见到了以后很多年一直指挥我们战斗的、威震四方的贺龙军长。在这支队伍里，我看到许多同志都和我一样，是穷苦出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仇和恨，但是大家并不仅仅是为了报个人的仇恨才战斗的。只有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解

放天下所有的穷人，才能使我们自己也获得解放。很快我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不再整天思念为个人报仇的事了。一心跟着队伍在家乡周围，来往游击，当然，恶霸地主李锡武他们也没逃脱人民的惩罚。

一九三〇年五月得到中央指示，要红四军改称红二军并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合，组建红二军团。当时我是在连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还说，中央要扩大红军三十万，发展苏区，进攻长沙、武汉，迎接全国红军大会合，当时，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

这之后我们就向公安县境内进发，一路上也有些战事发生，六月份，我们从公安县北的抖湖堤渡过荆江，到了江陵的郝穴。听说红六军就在这一带活动，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只听说两个军的领导干部，在公安县境内会合了，贺龙同志任总指挥还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同志任政治委员。

会师以后，兵分两路，去扩大苏区，红二军和红六军攻打监利县城未能奏效，接着又攻打汉水北岸的岳口。放了一阵子枪炮，就把几百人的保安部队吓跑了，我们在汉水上搭了座浮桥，进驻了岳口。

在岳口住了两三天，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搞得热火朝天。一天下午，正在开群众大会，只听外面喊声四起，还夹着纷乱的枪声，原来是敌人胁迫和利用一批游民正向我们进攻，镇外是被当地土豪买通的大刀队，也疯狂般地吼叫着，举着大刀长矛向我们的驻地扑来。因为街上住的多是机关，加上大刀会成员多是被欺骗和利用的农民，不使用炮火去杀伤，所以被他们一直冲到军部门口。正在这危急的关头，我突然听到一声大喊“十一团冲上去，其余各部撤过江

去！”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贺总指挥正站在街当中，镇定地指挥部队。本来有些不知所措的部队，经我们一反击，就使没有枪的大刀会寸步难进，到第二天拂晓，我们第十一团完成了任务，也拆了浮桥。

在这以后，我军连克天门、应城、京山、皂市、安陆等城镇，我所在的部队又打过陀双铺、毛家口。但和红六军一起攻打沙市时，一天一夜没有攻下，就撤到周家嘴一带。以后两军又分开，我们去打津市、澧县，却连攻数次未克，敌人大军压境，只好撤下来。

我们从澧县撤出以后，由石首向北行军，从弥陀寺拐向西，连日连夜地行军，吃饭也没有时间，大家真是又累又饿。这时正值秋末，萝卜上市的季节，我们只好沿途向老乡买萝卜充饥，说真的，那玩意儿在当时还真顶事。我们一路向杨林市开去，准备去打湖北保安师和湖南军阀周矮子的部队。一天，我们到达那里，就地宿营。

第二天早晨听说保安师来袭击我们，正从北面开来，我们红二军的几个团立即出发，急行军五里路，去抢占北面的山头，准备伏击敌人，把才收编不久尚未改造的国民党独立十四旅笕东阳部留在后方杨林市。

大约八点钟左右，敌人果然来了，一来就朝山上猛扑。由于弹药不多，我们等敌人靠近了，一阵手榴弹投过去，把他们打退了。敌人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可是奇怪得很，他们冲到半路，突然停了下来，慢慢地向后收缩，好象改变了主意。我们摸不透是怎么回事，从石头后面望过去，只见他们鼓噪一阵，又向前移动一段距离，象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大家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突然从身后“呼呼呼”传来激烈的

枪声，我们回头一看，从我们后面杨林市方向冲来一大群人，正朝山顶我们的人打起枪来，这时上面传下命令说：“符司令反水了，两面警戒。”

正面的敌人一听到我们后方的枪声，好象得到信号一样，立即发起凶猛的冲锋，看来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了，我们陷入腹背受敌，极为不利的形势之中，只好两面对付。从上午十点钟一直打到下午三点钟，伤亡了不少同志，直到传来向纸厂河方向转移的命令，我们才撤走。我们刚撤离山头，正面的敌人就冲上来了，从背后压迫我们，我们不敢恋战，部队反过头来向纸厂河方向冲去，把反水的部队冲乱了，他们向后收缩，退过街南的河，一把火把桥给烧了。我们冲到桥边，无法过去，这时从背后和河对岸射来密集的子弹，小炮弹也在我们中间不断地爆炸，保安师的敌人越来越近。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只见贺总指挥扑通一声跳下河去，高举驳壳枪，坚定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冲过河去，消灭敌人！”当时河水不算深，河面也不算宽，很快就涉过水去，一登上岸，就朝反水的敌人猛攻，他们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也趁机向西南转移。下午七点钟，到达纸厂河镇，当夜在这里宿营。

这一仗失利，使我们伤亡了不少同志，后方根据地也遭到极大的破坏，其中一部随段德昌重回洪湖根据地，一部随贺龙同志转移到湘鄂边，在鹤峰一带休整。在此期间，一面抽调不少干部组织工作队，重新对各县政权和党组织进行恢复，另一方面组织游击队扩大部队。通过休整，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在走马坪地区全歼甘占元部。

一九三一年，为了扩大游击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部

队向江北荆、当、远转移。攻占巴东后，次日北渡长江，进入了黄大鵬革命根据地，休息数天，部队进行了补给，尔后又先后攻占了房县、南漳、保康等县城，建立了各县苏维埃政权。当部队主力分路向石花街、老河口转移后，敌人将房县占领，我们再次返回，收复了房县，同年十月主力又南下洪湖，经南漳、保康等地攻打荆门县数日未攻下，年底进至洪湖地区。

一九三三年，我们又在松滋分兵三路，去攻打磨盘洲，记得一路是走斯家场，一路是走街河市，在小南海边上，队伍活捉了县长江文波和几个大土豪，并把他们交到总部，江文波被镇压了。在捉到的土豪中有个叫黄经济的，他给我们部队送了很多药材和白洋。打磨盘洲的第二天，我们又去打王家场，这一段时间由于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错误指挥，规定只能打大据点，打大仗，打硬仗，再加上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优秀干部，党组织被解散，战斗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致使我们在战斗中遭到失败，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那时我也被打成了AB团，改组派整天捆着绑着，但是运送弹药物资，我还是冲在前面。

一九三三年，我们被迫退出洪湖，经豫南陕南，川东转到房县、石花街、老河口，当阳、鹤峰、巴东、远安一带，恢复湘鄂川黔苏区，积蓄力量，我也就此远离家乡，走向全国战场了。

难忘的印象

裴希天

我七岁时，见过红军。以后，父母每讲到他苦难的身世时，定要说到他与红军接触的一段经历；说得较具体的要数解放后，他当上县一届人民代表的那年除夕讲家史。父亲说——

界线分明得很

庚午年（1930年）中秋节后，谣风一天比一天大，买卖冷淡，街上简直“可以打得枪”。听说李会轩‘三老爷’他们下了省，眼见郭健松‘大老爷’家逃往澧州城去了，谢伯融‘大老爷’避住在沙市；大点的‘字号’如：王广聚、高恒发、邓永兴、卢恒茂、瑞昌珍、苏同兴、倪万发……都把财货贵重衣饰早分藏到可靠的庄房（佃户）上；四家药铺只我一家在营业，其余的三家：庆寿祥、李恒发、杨万隆是‘良田裸纳’，早已关门下乡。小商小贩仍在营业，象：双和全、陈同义的小杂货店，吴科文鱼行，程隆茂肉案，王光兴豆腐铺，吴义发冷酒馆，文坤元茶馆……不过生意成了“摆设”，抱着“听天由命”的心理磨日子；脸上颇有得意神色的要算那帮‘皮家’（无产者）和贫民，如：龚伦富、毛学金，挑水卖的毛来发、老杨，炸汤圆卖的裴新仁，卖肉

菜的张兴柏么爹，卖伏汁酒的罗祖绪，打更的刘忠甲，赶马送客的谢承武……最怪的是“四大庙”万寿宫、关庙、城隍庙、栖凤寺的和尚们也都逃之夭夭了。

红军来杨林市

正吃早饭，‘皮家’龚伦富专来说讯：“先生！红军的先行排到了敖家咀，还是‘避避锋’好。”我要徒弟任正敏回官桥他家，他怎么也不肯，愿留下看店，并说‘出了事不与先生相涉’，你妈也不肯走，只得请打豆腐的王光兴用箩筐挑了你们兄妹俩，到老屋——距街约三里的裴家河大竹林子——去躲躲。天挨黑，你妈也到老屋来了，手提小木桶，内装几件湿衣。她说：“红军是吃中饭前到的，进了街都没惊动人，家家门上都‘号’了字。进我们屋住的有十几个，他们下门板‘搁铺’、扫地。我要正敏给‘老总’们快烧茶。他们中有一个出来拦阻，‘不让烧’，又问家里有几个人，当家的哪去了，几个小孩，‘他（指正敏）是你什么人’……我在屋里打住了餐把饭的光景，看到红军很规矩、很和气，听说他们是贺龙的人。我家斜对门郭健松的屋里住的总是当官的，门口还有两个拿枪的站岗。怕你们担心我，我就找了几件衣服一泡湿，装着要下河清衣服的样子，过河到老屋来了。”

红军很规矩的消息，不断传到老屋。远房年纪大的你们喊伯伯的几位，装着卖草鞋的，收狗粪的、捡字纸（敬孔夫子）的，陆续上街打探究竟；你妈也央求你大伯上街看看我们屋里的情况。你大伯上街后回来说：药柜原封未动，只是未见正敏的人；豆腐铺、鱼行、肉案都“打开”了，茶酒馆

也“打开”了，桥头有站岗的，但对来往的人并未见盘查。你妈听了有点后悔。大伯说：“谁个是孔明先生，未卜先知？不分家，一个锅里吃饭，住几天，有吃的，等时局落了阵再送你们上街！”

避到老屋的第四（五）天的早饭后，你大嫂子陈么姐在门口做鞋——实际是‘了望哨’——发现从河边走来三个人，便打咳嗽使屋里的年轻男人都从后门藏进了竹林里。你大伯抽着竹竿丝烟袋走出门外，见那来的三个中有一个停下了步，一个军装，一个便衣，站在距老屋约半里外的‘坟莹丘’边；走来的是个穿军装的，口音四川人，问你陈么姐：“大姐，街上开药店的裴郎中住在这里？”“哪个开药店的？”“他招牌是松鹤堂，我特来请他回去，给弟兄们去看病的；我们是红军，穷人的队伍嘛，叫他不要怕！”“今日赶早，后面‘碾钟坡’一户‘家门’接他看病去了！”“那，这个条儿给裴郎中，欢迎他快点回去！”说完就走了。你妈随着从里屋来到门口，与你大伯指辨着站在‘坟莹丘’的那两个。认出穿便衣的是‘皮家’龚伦富，穿制服的是徒弟任正敏，已换装了。你大伯把“纸条”给你妈，说这是“放行”，有了它就可大大方方回去，象“通关文牒”，盘查哨看了就不会问长问短。这下好了！

你大伯和陈么姐送我们回街上。河北岸桥码头的盘查哨看过“放行”。我们回家一看，除搁了长铺住着十来个人外，一切的确原封未动。没等你妈一炊壶水烧开，从斜对门郭健松屋里走过来一个当官口气的人，他说：“把你请回来，给弟兄们治‘摆子’（疟疾），‘打摆子’的多，需要做大量‘短摆子’的丸子。”“小本药铺，没这么多材料。”

“街上跑掉的那三家药店的药，我们搬来供你用嘛。”“再说人手也缺，一个徒弟进了贵军的营盘，只我们两口，丸药要的又是那么多！”“人，归你去找，工钱、你的药钱，我们照付，只是时间要赶紧些！”我才去请黄汉卿先生（习过医药，贩卖山菸谋生），又找来伍经诗（已出师的徒弟，改行卖姜糖），还请了两个碾药的零工，不分日夜赶做“疟疾丸”，每粒做成麦李子那么大，用‘团窝’装。我每天还到上街、下街、河街、半边街去给官兵们看病。当官的、当兵的都和气得狠，全不象‘北胯胯’（北洋军阀）恶慑慑的。药钱，算多少给多少。街上除大字号没营业外，其他的门面都‘打开’了，摊贩比往日还多，赶场的人也越来越多，市面也热闹了些。

天一麻亮，吹起床号——“打滴，打大，大滴，大打……”叠铺盖、扫地、洗脸，集合唱军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队伍穿军装的多些，穿便装短褂的也有，有背枪的，有扛梭镖的，还有挎马刀的。出操去一路喊着——“打倒土豪、打倒劣绅……”的口号。栖凤寺山上的操场、万寿宫山上的操场、河滩上的操场，“跑步走”“齐步走”“一、二、三、四”的呼号声，此起彼落，的确威武。收操回营，吃饭休息，再就是“开演说”“开会”（报告、学习）。午餐后又出操。晚餐后，休息，洗，打草鞋。睡前集合点名，唱军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吹号熄灯睡觉。街上戒严，家家点有门灯。街头四面都放有排哨。有时可以听到哨兵发出的声音——“什么人！口令！”

逢三逢八是上街的人最多的日子，开赈，有两处。上街在高恒发门前，下街在苏同兴的门前。来领赈的穷苦人聚集

起来，先是听“开演说”（宣传），再才“开赈”。排成队给每人一撮瓢米，或一碗盐，或一段布，或一茶杯食油，或给“洋油”“洋火”。凡领赈的，不分老小男女，见人一份，但监督不准重领。也有人在上街领了，急忙又赶到下街来领的。

红军是不信神鬼的。万寿宫、栖凤寺、城隍庙、关庙的菩萨全被打毁了，泥塑的填了坑，面了路，木雕的淋上油蓬起烧了，还在河滩上开会演说：菩萨是哑吧劣绅，和尚是张口劣绅，和土豪劣绅是一样剥削穷人的，所以也归打倒。

有天，红军正开早饭，住我们家的几个小声惊喜的传说贺军长刚进去——斜对门郭健松屋里——后面还跟了四‘架’（把）‘盒子’（短枪）。大约只隔餐把饭的工夫，贺军长出来跨上了牵来门前的骡子，个子不矮，唇上留一字胡，腰带上挂着‘八音子’（小手枪），四个‘护兵’跟在后面急走。

贺军长来后的大概两三天吧，那天天还没亮，‘打大滴、大打滴——’集合号吹得紧，住在我家的、隔壁的、对门的红军打背包，上门板，扫地，还东西，接着来了个查看屋里的打扫、问借的东西还没有、有没有用坏的，最后是要我做“疟疾丸”的那个官长来了，他说：“感谢你，裴郎中！我们马上要和白军接火（开战）了；不要出去，用被絮顶在头上，关上门在家里坐；我们还会来的。”说完还向我敬了个礼，朝上街急忙走去。早饭时候吧，“开火了”，有步枪声，也有咯咯咯的机关枪响，打的时候不长。之后，街上便听不到什么动静了。中午过，打更的刘忠甲在街上打锣，喊：“红军已退，罗校之的队伍马上开到，各家各户要插欢